

试论诸葛亮“兴复汉室”的理想及其实践

李殿元

“兴复汉室”，是诸葛亮为之奋斗终生的政治目标。他在《隆中对》和《出师表》中，都曾谈到这个问题：

……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进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关于诸葛亮“兴复汉室”和志向问题，近几年有的研究者认为，在对全局战略形势的分析上，诸葛亮并不比孙权、鲁肃高明。他们的理由是：鲁肃在“合榻密议对”中已明确提出了“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这个看法提出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七年之后刘备才三顾茅庐，而诸葛亮却既承认曹操强大：“此诚不可与争锋”，又提出“汉室可兴”的结论，“他显然不比七年前的鲁肃更高明”^{〔1〕}。对这种看法，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兹对诸葛亮“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及其实践努力试论如下。

一、“兴复汉室”的实质是实现统一

诸葛亮（公元181—234年）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东汉统治大崩溃，社会秩序大动乱的时代。

由于家庭的原因，诸葛亮从山东流徙到荆州，亲身经历了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天下分裂、军阀混战等造成社会秩序大动乱的变迁，因而对人民在动乱中所经受的苦难，有深刻的体会和理解。

诸葛亮从小就受着食君禄、报皇恩的

封建正统观念的熏陶，再加之他在隆中十年间系统地学习经史子集，逐渐形成了他一整套忠君报国的政治主张。在封建时代，忠君和爱国，一般来说是很难分开的。君主是作为国家的象征而存在的，忠君必爱国，爱国亦必忠君。这虽有其时代的、历史的局限，却是不应指责的。因此，诸葛亮在隆中时提出的“兴复汉室”这一要求，其实质是要求统一，要求重建正常的、稳定的社会秩序。

面对东汉王室的衰微，群雄并立，争战不休的严重局面，诸葛亮提出“兴复汉室”，并自比管、乐，显然是既希望自己能够象管仲当年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那样来兴复汉室；又希望自己能够似乐毅那样扶持弱燕，统帅强兵，一举下齐七十余城那样去扫除群雄，结束分裂。

诸葛亮的隐居地隆中，当时属荆州南阳，东汉光武帝刘秀正是从这里发祥而中兴汉室的。诸葛亮对此十分熟悉，曾专门写过一篇《论光武》的文章，表现了诸葛亮对统一的渴望。在当时，要争取统一，诸葛亮完全可以去辅助曹操，也可以去辅助孙权。但是，由于诸葛亮具有很强烈的正统观念，他把控制汉献帝的曹操视为“汉贼”。孙权虽为“人杰”，但缺乏一统天下的雄心，力图偏安江东保全父兄业绩。因此，曹操、孙权都不适合诸葛亮所要选择“明主”的标准。他隐居隆中，目的就是“待时凤翔”，等待“明主”。这实际上正是看到了荆州这块地盘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极想辅助“明主”再走一次光武帝统一中国的道路。

必须指出的是，诸葛亮提出“兴复汉室”的实质，是以此作为统一的口号，而非要去维护或恢复已经快要崩溃了的东汉王朝的黑暗统治。因为，诸葛亮所选择的“明主”刘备，虽自称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但《典略》早就指出他不过是“临邑侯枝属也”，正如裴松之所说：“先主虽云出自孝景，而世数悠远，昭穆难明，既绍汉祚，不知以何帝为元祖以立亲庙”⁽²⁾。诸葛亮对此不会不知道。他选择刘备为“明主”的主要原因，决不是因为他姓“刘”，而是刘备本身所具有的若干长处。如果仅仅因为是“刘”姓，那么刘表、刘璋等人或许更有价值。此其一。其二，如果是要维护或恢复东汉王朝的统治，那么，后来曹丕废掉汉献帝后，诸葛亮主持朝政的蜀汉政权就不应借口“或传闻汉帝见害”⁽³⁾乘机让刘备称帝，而应当首先起兵勤王。可知诸葛亮“兴复汉室”的实质是要以一个新的汉王朝去取代旧的汉王朝，重新实现统一并建立强大的封建王朝。

在当时，“兴复汉室”的条件并不具备，诸葛亮对此十分清楚。因此，他在“隆中对策”中提出的方针是分阶段实施：第一步是“跨有荆、益”，与曹操、孙权形成鼎立之势；第二步是等待时机，当“天下有变”时，则两路出兵，夹击中原。这个先走向三分，再求统一的战略决策，比之鲁肃的“合榻密议对”，要高明得多。鲁肃的议对只是提出了“隆中对策”中的第一步，而“隆中对策”则有第二步，所以它比鲁肃为东吴制定的立国方针更全面、更具体、更详尽。

二、“兴复汉室”使刘备集团具有强大政治诱惑力

诸葛亮既然选择了刘备为“明主”，希望通过对他的辅助而实现天下的重新统一，就不会不从如何有利于刘备集团发展的各个方面去进行思考、制定策略。在以

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时代，皇权是神圣的，正统观念不仅是地主阶级笼络人心、夺取政权的有力武器，就是中国农民起义者也常加以利用。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就是以“秦王公子扶苏”的名义发难的；西汉绿林赤眉起义，也打出“反莽复汉”的大旗。尤其是西汉董仲舒所谓“君权神授”的理论被反复宣传后，更是如此。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就牢牢地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连占据江东已历三世、实力雄厚的孙权也只好“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谁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就一定可以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

刘备本是一位颇知天下大计，并长于知人善任的封建政治家。《三国志》作者曾对他作过较多的描述，说刘备“少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又引曹操的话说“天下英雄，唯使君（刘备）与（曹）操耳”。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谋士如鲁肃、周瑜、孙权、郭嘉、程昱、荀彧等都异口同声地称赞刘备“甚得众心，而不为人下的一世之杰”。连当时的大军阀如袁绍、刘表、陶谦、刘璋等都对刘备“倾心敬重，以上宾之礼待之”。诸葛亮也认为刘备是“英才盖世，众士仰慕，与操并争天下”的英雄。但这位“英雄”在遇到诸葛亮前，却因各方面的原因而屡经挫败，颠沛流离，竟没有一寸立足之地。诸葛亮必然会考虑，假如让刘备举起“兴复汉室”的旗帜，在政治上就可以占据有利的地位，使刘备集团具有强大的政治诱惑力；而刘备又正好是汉室的宗室子弟，说他以“兴复汉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既不言过其实，又有利于吸引人心，招揽人才。所以，在“隆中对策”中，诸葛亮就明确地对刘备指出：“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⁵⁾这就是要刘

备充分利用他是“皇室之胄”这个政治上的有利条件，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

纵观三国历史，刘备集团正是充分利用了“兴复汉室”这一口号，从而获得了若干好处的。比如：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率军南下，刘备只得“率其众南行”。诸葛亮奉命去向孙权求救时，就是以“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而说动孙权与刘备结成同盟的^{〔6〕}。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益州刘璋因闻曹操欲讨张鲁，“内怀恐惧”，张松即建议请刘备入川，并说：“刘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7〕}刘备集团因而占领了益州。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春，刘备集团上疏表刘备为汉中王，表说：“陛下蒙尘忧厄，幽处虚邑。人神无主，遇绝王命，厌昧皇极，欲盗神器。”而刘备“受朝覲秩，念在输力，以殉国难……（刘）备肺腑枝叶，宗子藩翰，心存国家，念在弭乱”。刘备也上言汉帝曰：“……不得扫除寇难，靖匡王室，久使陛下圣教陵迟，六合之内，否而未泰，惟忧反侧，疚如疾首。”于是就当上了汉中王。^{〔8〕}

曹丕篡汉后，刘备集团又以刘备“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祗降祚，圣姿硕茂，神武在躬，仁覆积德，爱人好士，是以四方归心焉”，而“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9〕}。

从上述几个事实可以说明，“兴复汉室”并非要恢复东汉王朝的统治，它只是刘备集团用以发展本集团势力及维护本集团利益时的一面旗帜。刘备集团依据“兴复汉室”的政治诱惑而取得了不断的发展壮大。

三、“兴复汉室”的可能性

诸葛亮从隆中出山之后，即按照“隆中对策”中提出的战略决策分阶段去实施“兴

复汉室”的理想。然而，历史实践的结果是：隆中决策只实现了一半，完成了天下三分，而没有完成第二步北进中原，统一中国，兴复汉室的目标。那么，在当时，诸葛亮提出的“兴复汉室”究竟有无可能呢？

“兴复汉室”的可能性是的确存在的。公元219年，刘备取得汉中，跨有荆、益，具备了两路北伐的条件。镇守荆州的蜀将关羽出兵攻襄阳，大败曹军，威震华夏，逼得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10〕}。这只是一路北伐，竟有如此威力，足证许昌以南拥汉反曹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也说明“兴复汉室”是具有可能性的。

但是，可能性毕竟没有变为现实性，其原因是复杂的，而这些原因，或许并不是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可以预料到的。追本溯源，形势发展到不可逆转，一则在荆州之失，再则在于夷陵之败，而这两者都不是诸葛亮所能挽回的。

荆州之失，正好发生在打下汉中，蜀汉事业大盛之时。按照隆中战略规划，在夺取荆、益之后，就必须“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然而，荆州守将关羽不把诸葛亮整个隆中战略放在心上，给孙权以可乘之机，不但荆州丢失，关羽自己也遇害。

荆州既失，“隆中对策”中的战略方针受挫，尤其坏事的是刘备不顾益州初定，自己刚登皇位，蜀汉基业未固的现实，因忿关羽为孙吴袭杀，就意气用事，劳师动众，既不许孙权请和，又不听臣下劝阻，亲自率师伐吴。夷陵之战，刘备被陆逊一把火，烧得蜀军死伤累累，损失惨重。刘备自己败归白帝，以至“中道崩殂”。这样，“兴复汉室”——以刘备集团实现国家统一的宏图也自此成为泡影。

四、“兴复汉室”是诸葛亮作为政治家的毕生追求

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决不会只求割据

而不求统一。诸葛亮之所以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就在于他为统一事业而竭尽了自己的全力。

“夷陵之战”后，蜀国元气大伤，三国鼎立的局面最后形成，魏、蜀、吴三国彼此都不具备统一中国的实力。诸葛亮实现“兴复汉室”这一理想的可能性已不再存在。然而，作为政治家的诸葛亮，却仍为这一理想进行着终生的奋斗。

刘备死后，蜀国“政事元巨细，咸决于（诸葛）亮”^{〔11〕}。诸葛亮经过五、六年的充分准备，修复了与东吴的关系，平定了南中之乱，从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壮举的以求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他在《出师表》中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从中可以看到他北伐的意志、决心以及务求必成的信念是何等坚定。正因为如此，所以诸葛亮在北伐中，虽因面对强大的敌人而一再遭到挫折，但他矢志不渝，毫不气馁，八年之间五次出兵北伐曹魏，其志之坚足以证明。他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为统一竭尽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演出了一幕“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壮史剧。

当时，虽经诸葛亮的努力，重新修复了吴蜀联盟，但往日的景象毕竟已一去不再复返了。到诸葛亮北伐时，魏国历经两代的经营，根基已经牢固，诸葛亮仍以“兴复汉室”作为统一的旗帜、口号，已经显得过时，再也不能起到摇撼人心的作用了。以第一次北伐来说，准备可谓充分，进展也很迅速，可是一当魏明帝西镇长安，一举打下街亭，就逼使诸葛亮收兵而返。再看最后一次北伐，尽管史书上赞美诸葛亮分兵屯田，和当地的老百姓相处得很不错，但当诸葛亮一死，百姓就“奔告司马懿”^{〔12〕}。这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魏国老百姓对诸葛亮进行北伐战争的态度是不欢迎

的。所以，后来有人认为，当时天下三分，赤壁之战是肇其端，而起决定作用的实为夷陵之战。这是颇有道理的。自夷陵之战后，由于蜀国元气大伤，诸葛亮纵有一颗忠心，满腹经纶，也改变不了已经定局了的客观形势。诸葛亮闭关息民，整军经武，五次北伐，实在也是“其不可为而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作为一个政治家，诸葛亮没有因为客观形势变化而放弃统一中国的大志，这是难能可贵的。他虽明知己不可为，却仍然沿着隆中规划的战略路线走下去，苦心孤诣，惨淡经营，竭尽了自己的主观努力。虽未能成功并因心力交瘁而死，但在历史上为他自己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在诸葛亮一生的事业中，“兴复汉室”作为他的政治理想而为之奋斗了终生。虽然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竭尽了全力也未能实现其统一天下的抱负，但是，在为“兴复汉室”的理想而进行的不懈奋斗中，却为后人树立了一个为理想而奋斗的楷模。

不言而喻，要是诸葛亮没有为“兴复汉室”竭尽全力，而是格于形势，拘守小局，偏安巴蜀，老死闾下，不作为一个失败的英雄，恐怕后世对他的称誉决不会有如此之隆；评价也必将大为不同。人们对他的盛赞中，显然包含对他“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及其为之而不懈奋斗的充分肯定。

注释：

〔1〕据常崇宜《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诸葛亮的“批判思维”》，见《成都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2〕〔3〕〔7〕〔8〕〔9〕据《三国志·先主传》及裴松之注。

〔4〕〔5〕〔6〕〔11〕〔12〕据《三国志·诸葛亮传》及裴松之注。

〔10〕据《三国志·关羽传》。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史研究馆
责任编辑：王定璋